



# 羊皮上的烽火誓言

艾 荣



第二张羊皮褥子(左权县文史博物馆藏)

1940年寒冬，山西辽县(今左权县)上武村，北风呼啸中，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的师生们围坐在简陋的校舍内，借着微弱的光亮，在有限的物资条件下，以羊皮褥子为纸，以炭笔为墨，记录下自己的信念与决心。

“辽县上武村，鲁艺学校，紧张严肃刻苦虚心，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第一张)；“鲁艺学校，辽县上武村，坚定理想信念，明确文艺工作方向任务，克服困难。罗工柳”(第二张)；“鲁艺学校，辽县上武村，坚定理想信念，明确文艺工作方向任务，克服困难。胡一川”(第三张)；“前方鲁艺，辽县上武村，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四张)；“前方鲁艺，辽县上武村，紧张严肃刻苦虚心，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第五张)——这些朴素而坚定的标语，与鲁艺学校的标识一同被精心绘制在五张大小不一的羊皮褥子上。

8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珍贵的羊皮褥子已成为左权县文史博物馆的重要收藏。每张羊皮褥子上方都绘有醒目的党徽，部分还配有军徽，下方则是用炭笔或颜料书写的文字，标注着“辽县上武村，鲁艺学校”及创作时间——“一九四零年十二月”。

1940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当年1月，晋东南鲁艺学校(亦称“前方鲁艺”“太行鲁艺”)在武乡县下北漳村成立，同年10月随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迁至辽县上武村。这所学校开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和普通科，设立诗歌、文学创作课程及木刻工场。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鲁艺师生们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艺术为武器，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建设着一支“文化军队”。

羊皮褥子上提到的罗工柳与胡一川，是这支“文化军队”的杰出代表。罗工柳后来参与创建中央美术学院，胡一川则担任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创作了《饥民》《到前线去》等反映根据地生活的木刻佳作。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刀笔为枪，以艺术为盾，用作品点燃民众的爱国热情。

# 石塔归乡

星 路



邓峪石塔(山西博物院藏)

邓峪石塔静静矗立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厅中，虽历经岁月沧桑与流离波折，却依旧散发着盛唐的独特魅力，诉说着一段跨越海峡的传奇归乡故事。

邓峪石塔造像，作为山西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诞生之地在晋中市榆社县郝北镇邓峪村。它雕刻于唐开元八年(720)，通高3.2米，整体呈圆座方柱形，自下而上由底座、塔身、塔檐(带平座)、塔刹四部分套合而成。四面雕刻的佛像造型端庄、形面圆润、体态丰腴，具有典型的盛唐时期特征。佛像神情沉稳、衣纹流畅自然，线条起伏转折间，将布料的质感与佛像的动态完美融合，体现出唐代雕刻艺术的精湛技艺与高超水准。这些佛像是盛唐艺术风貌的生动写照，对于研究唐代佛教艺术与雕刻艺术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然而，这座承载着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石塔，命运多舛。1998年，石塔的塔身不幸被盗，从此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漂泊生涯，其间辗转流落至台湾。幸运的是，它被信众捐赠给了中台禅寺。中台禅寺的惟觉长老在得知石塔来自山西后，心怀对故土的眷恋与敬意，留下要将石塔捐赠返还的遗愿。在两岸的通力合作下，这场跨越海峡的文物归乡行动得以推进。失窃近20年的石塔塔身，终于在各方的努力下重归故里，在2017年回到了山西博物院，与家乡的土地再次紧密相连。

如今我们在展厅中看到的邓峪石塔，底座和塔顶是根据现存于当地的原物复原而成。而塔刹部分，至今仍不见踪迹，只能依据档案资料复制。尽管并非完全的“原装”，但石塔所承载的历史记忆、艺术价值，以及那一段两岸携手让文物回家的温暖故事，却丝毫未减。



写有“诗三百五篇”的海昏简《诗经》(资料图片)

# 牵动人心的古钟

李培荣

在吕梁山余脉的娄烦大地上，两口跨越五个世纪的明代古钟，牵动着潘家庄、蔡家庄等村落几代人的情感。它们何以穿越几百年风雨，成为乡土记忆中最深刻的情结呢？答案藏在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里，刻在斑驳锈蚀的钟身纹路中，更融在娄烦大地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里。

“这口钟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跟它感情很深，一直把它看得很重很重！”潘家庄村民回忆道。自记事起，老一辈人就讲述着那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往事：很久以前一个暴雨倾盆的日子，村前南川河方向突然传来“救命，救命！”的急切呼喊。村民们误以为有人失足落水，纷纷冒雨赶往河边，却未见半个人影，唯有口古钟在洪水中随波漂浮。“难道是这口钟在‘呼救’？”带着几分惊奇与敬畏，村民们齐心协力将钟打捞上岸。最初，古钟被安放在村中名为“铺上”的山梁上。为了更好地守护这份天降“宝物”，20世纪70年代，村民将其迁至当时“十二眼窑院”的大队办公室；2001年，又移至曾为寺庙的村小学院内。

平静的守护在2006年被打破。10月15日晚10时还完好无损的古钟，次日清晨竟不翼而飞。此后四年多，寻钟成了孙绪家等村民心中最重要的牵挂。他们走村串户打听



华塔寺古钟

消息，远赴他乡四处搜寻，从未放弃找回古钟的念想。2010年9月8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有人在太原文庙的晋商实物遗存展上见到了萎顿的古钟。村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赶往那里，当那口刻着熟悉纹路的古钟映入眼帘时，在场的村民都热泪盈眶。“终于找到了，就是这口钟！”大家激动地相互转告喜讯。如今，这口漂泊多年的古钟终于回归故土，安稳存放在娄烦县文化和旅游局库房展厅，继续守护着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这口华塔寺古钟的珍贵，不仅在于它承载的民间记忆，更在于其厚重的历史价值。古钟由生铁铸就，保存完整，钟体呈圆筒状，整体折肩，外撇弧度较小。通高1.1米(含蒲牢钟钮)，钟腰周长2.4米，八个面分别镌刻着铸造时间、人物、村名、功德主等关键信息。铸造于“明弘治八年(1495)”的铭文清晰可辨，落款为“山西太原府静乐县王铺一都番明下舍村华塔寺住持僧海伦，门徒玄美、玄铸”，还记载了“潘家庄”“大圣堂”“边家庄”“郭徐沟”等11个村庄的铸造功德主姓名。钟腰牌位下方的图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唐僧师徒四人牵马西天取经图、猪八戒肩挑行李囊在前探路，孙悟空一手持金箍棒、一手牵马紧随其后，唐僧头顶佛光圈缓步前行，沙僧扛降妖宝杖殿后护法。铸图简约粗犷却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历经500年风雨仍清晰可辨，令人惊叹不已。

无独有偶，娄烦人的记忆中还珍藏着另一口同样传奇的明代古钟。马家庄乡大圣堂村西北部的花果山(又名龙和山)，海拔1806米，昔日山上唐代修建的清凉寺内，曾悬挂着一口由周围48个村集资铸造的古钟。寺庙被毁后，周边村庄为争夺古钟守护权各执一词，最终众人议定了一个充满乡土智慧的办法：将钟放倒在山顶转动，停止后钟口朝向哪个村庄，古钟便归哪个村守护。命运的“指针”指向蔡家庄，村民们满心欢喜地将古钟抬回村中，悬挂在村口老树上，一代又一代悉心守护着这份来之不易的传承。遗憾的是，这口承载着48个村情谊的古钟后来被盗，至今杳无音信，成为娄烦人心头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万幸的是，在清凉寺古钟丢失前，当地文化学者李国成老师已及时抄录钟文并拍摄完整清晰的照片，为这一珍贵文化遗存留下了重要记录。从照片中，我们得以窥见清凉寺古钟的风采：钟高1.5米，口径1米，上部设六个面，其中一面铭文记载“弘治十一年(1498)四月吉日造，皇帝万岁，铸钟一口重一千一百”；下部六个面详述铸造缘由，讲述僧人开晓因病得愈后，为感恩诸佛护佑发心铸钟，文末打钟偈“闻钟声，烦恼轻，离地狱，出火坑，智慧长，菩提生，愿成佛，



清凉寺古钟

度众生”。钟腰中部六个面，分别镌刻唐僧师徒四人牵马经图、两条龙纹图、一组童子莲花图和一组孔雀石榴图，最下方为八卦图案，12个文字版面完整记录了铸造年代、缘由，以及“大圣堂”等参与铸造村庄功德主姓名。该钟铸造工艺精湛，是不可多得的珍品，极具研究价值。

两口古钟最令人称奇的共同之处，在于钟身均刻有生动传神的唐僧师徒四人牵着白龙马西天取经的图案。华塔寺古钟铸造于1495年，清凉寺古钟铸造于1498年，而《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约生于1510年间，这意味着两口古钟的铸造时间比吴承恩出生还要早十几年，比《西游记》成书大约要早七八十年。这一重要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早在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之前，相关故事便已在娄烦地区广泛流传。此地不仅有花果山、大圣堂等相关地名，更有供奉孙悟空的猴王庙遗存，2005年，文化部在此竖立“西游故事源萌于此，花果悟空遗迹在兹”的标志碑，确立了娄烦作为“大圣故里、西游源头”的文化地位，也为研究这部古典名著的历史渊源与传播脉络，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佐证。

如今，华塔寺古钟静卧展厅，清凉寺古钟杳无音信，但它们承载的情感与意义从未消散。对娄烦百姓而言，它们是护佑村落的神明，是先辈留下的珍贵馈赠，更是维系乡愁的文化根脉；对历史研究而言，它们是明代铸造工艺的典范，是佛教文化与民俗传统的鲜活载体，更是见证《西游记》故事流变的原生印记；对岁月而言，它们留存着娄烦的乡土记忆，传承着深厚的文化基因。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华塔寺古钟上唐僧师徒四人牵着白龙马西天取经图案

# 冬日太原赏彩陶

钩 希

秋冬之际，一场特别的展览“河湟陶韵——青海陶艺术文物展”在太原市博物馆展出。展览展出了来自青海的115件(套)珍贵彩陶，为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西部史前文明的窗口。展品主要来自青海乐都柳湾墓地。1974年至1981年，那里发掘了1730座墓葬，出土文物近4万件，彩陶多达2万余件。

在众多展品中，一件人头像彩陶格外引人注目。这件陶壶出土于青海柳湾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彩陶艺术的杰作。这件彩陶壶最明显的特征是隆起的半圆面壶口被精心塑造成一副生动的人面。人面部略呈方形，耳、鼻为捏塑而成，眼睛、耳、真雕空，头发、睫毛、胡须、纹身均以黑彩绘制。人像眼睛半闭，高鼻、口微张，十分生动。器身两侧有耳，上部用黑彩绘有圆圈纹5个，下部为素面。这件陶壶融合了塑、雕、绘等多种技艺，且制作精良、栩栩如生，尤其是人面上的纹身，是原始社会纹面习俗的实物例证，推测被用于祭祀仪式。

另一件引人注目的展品是裸体人像彩陶壶。它1974年出土于青海柳湾遗址，高33.4厘米，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物。这件彩陶壶的独特之处在于腹部堆塑

塑的裸体人像。人像双手交于腹前，头部位于壶身颈部。该人像因兼有两性生殖特征而引发学界讨论。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远古萨满信仰中的两性人形象，是天地人神的中介。也有观点认为它反映了生殖崇拜。值得一提的是，这件陶器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浮雕艺术，被载入我国美术史教科书中。

展览中还有一件造型独特的双体陶罐，同样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出土于青海柳湾遗址。其高约11厘米，造型独特，整体呈现葫芦状，由两个相连的瓶身构成，底部相通，口沿与肩部各自独立。器表原有彩绘纹饰，但因年代久远，现已大部分脱落，仅存零星色彩痕迹。据推测，此罐在原始社会晚期主要用于部落间的和解仪式：双方首领通过共饮此连体罐中的酒，消除仇怨、订立盟约。这一功能后来逐渐演变为古代婚礼中夫妻共饮的“合卺”礼俗，成为象征婚姻结合的重要器物。

彩陶是史前先民创造的精美器物。它们不仅是生活用具，更是原始信仰与艺术的结合。太原市博物馆的“河湟陶韵”展通过一件件彩陶，连缀起一幅史前中国西部文明图景。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 海昏简《诗经》是什么版本

郭 冰

用字、文本结构及训诂注解不同。

对于简牍，考古界有“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的说法，因海昏侯墓室被地下水淹没，这些简牍才得以留存两千余年。

但也因地下水浸蚀，简牍结构遭到严重破坏，出现泡水、卷曲、变形、腐朽，因此对修订现存《诗经》版本的贡献不大。

西汉时期，关于《诗经》的各流派中，先后有齐、鲁、韩三家诗。

被立为官学。与官学相对的是民间传授的《毛诗》。到东汉末年，“三家诗”逐渐失传，《毛诗》因远离政治中心及备受名士郑玄推崇，得以流传至今，现传《诗经》就是《毛诗》版本。

北大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在其主编的《海昏简牍初论》一书中，对比了海昏简与现传《毛诗》和《熹平石经》等文物文献的文本结构，推断海昏简《诗经》应属于《鲁诗》。

冬至将至，北风里开始飘起饺子的香气。家家户户准备着团圆的餐食，却少有人想到，两千年前的古人餐桌上，已有形似饺子“伴侣”的器物。

荆州博物馆珍藏有一把战国时期的错银勺，长21.8厘米、宽4.6厘米，与捞饺子的笊篱极为相似。勺身为椭圆形，镂空雕出对称的龙纹，勺柄末端透雕着卷云纹形状的对称凤鸟纹。这把勺子与铜鼎、铜壶等生活用具一同出土，从考古发现来看，此类镂空勺常与盛放熟食的食器如盏、簋、鬲等组合出土，推测其功能类似于现代的漏勺，用于捞取汤中食物或取食饭粥。

而在南越王博物院，珍藏着另一件饺子“伴侣”——铜姜碟。这件青铜器具整体呈匙形结构，通长13.3厘米、高5.2厘米，采用分体浇铸工艺制作而成。它的设计极为精巧：上半部分为长方形凹槽，内壁密布锥状乳钉，用于研磨生姜；下半部分为设有漏孔的半球形结构，方便姜汁渗出；凹槽上端设有直径3厘米的挂环，便于悬挂收纳；背面四只短足的设计，既保证放置稳定性，又能在磨姜时避免器皿被污染。南越王墓共出土了两件姜碟，分别存放于后藏室与西耳室，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我们今天做姜末和蒜蓉来调配饺子蘸料的工具，其基本原理和用法与这件铜姜碟非常相似。

在这个冬至来临之际，当我们围坐在一起准备饺子时，不妨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用荆州博物馆错银勺捞取饺子，用南越王博物院铜姜碟制作姜末和蒜蓉蘸料。一勺一碟之间，承载的不仅是古人的饮食智慧，更是跨越千年人文传承，为我们寒冷的冬日增添了一份深厚的历史温度。



铜姜碟(南越王博物院藏)

# 古人的饺子「伴侣」

郭 悅



铜姜碟(南越王博物院藏)